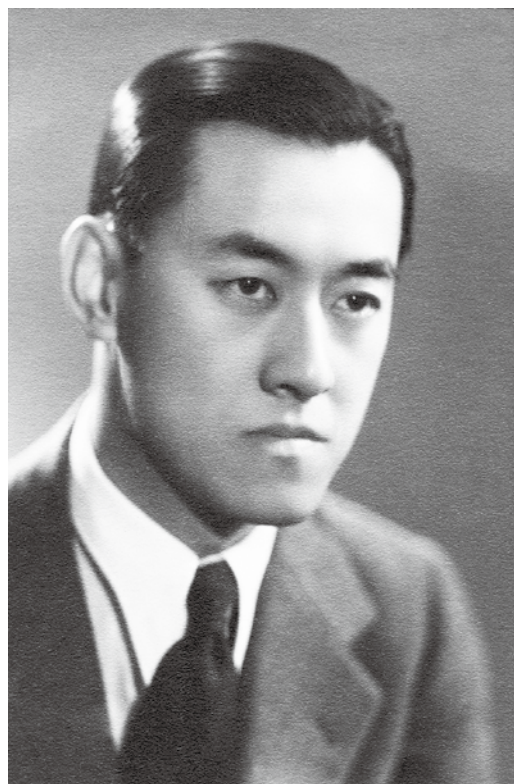


往事 偶記

陳岱孫 著



作者像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陳修和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 錄

往事偶記（代序） / 001

私塾內外——童年學習生活片斷 / 019

我和英華學校——對「專讀生」制度的回憶 / 027

鄉聲 / 032

我的青年時代——從求學到從教 / 036

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 / 062

綏北道上 / 077

笛吹弦誦情彌切 / 089

抗戰中的西南聯合大學 / 093

西南聯大校舍的滄桑 / 098

西南聯合大學的蒙自分校 / 108

日軍鐵蹄下的清華園 / 113

給清華大學校史組的信 / 119

福建省閩侯縣螺洲鄉太傅陳公生平鉅略 / 122

回憶梅貽琦先生 /	141
回憶葉企孫先生 /	149
回憶金岳霖先生 /	156
憶念周培源先生 /	163
回憶張奚若先生 /	173
回憶劉仙洲先生 /	176
後園種菜憶沈同先生 /	179
懷念許滌新同志 /	182
我和商務印書館 /	185

附錄：梁思成、林徽因致陳岱孫的六封書信 /	188
-----------------------	-----

編後記 劉昀 /	206
----------	-----

往事偶記（代序）

我於 1900 年 10 月生於福建閩侯的一個所謂「書香門第」的家庭，實際上就是一個中落的舊官僚家庭。我的祖父，曾考得進士，供職翰林院。散館之後回了家，就聘於福州鰲峰書院任山長之職終其身。在這個封建式的家庭中，他是一個嚴厲的統治者。

我在家裡是長孫，父祖輩都以「克紹家風」為期待。清末「廢科舉，立學校」斷絕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我的幼少年教育仍然延續着傳統的模式，從六歲至十五歲都在私塾讀線裝書。甚麼經、史、詩、文都以不同的分量、不求甚解的要求，填進了腦子裡。

在私塾的最後四年我經歷了一個胡亂偷看書的階段，老師管束很寬，而我對於塾裡的「正經書」的學習感到乏味。恰在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裝滿書籍的藏書閣樓。從此，我就在應付「正經書」學習要求之餘，鑽進這個閣樓選擇一些似乎可以看懂的書，甚麼歷史傳記、筆記、小說、詩歌、詞曲等等，亂七八糟的無所不看。因為是偷看，所以總是躲躲閃閃，

匆匆忙忙地看了一本又一本。這樣的亂看當然沒有甚麼益處，但也增加了一些生活的知識。

推翻清皇朝的革命發生於 1911 年，在此前好幾年清皇朝早已頒佈了「廢科舉，立學校」的命令。外邊的世道變了。我的祖父於 1912 年冬去世了。但當我祖父在世的時候，外界的新風吹不進我的封建家庭，孩子們的教育還是一仍舊貫。「洋學堂」式的各級學校已相當普遍，私塾已到了末日，我們成為末代私塾的末代學生。祖父去世後，我們的父輩不能不認真考慮下一代的學習問題了。1913 年，讀書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我十三歲的那一年，我除了還在私塾讀書外，又請附近小學一位老師教英文、算學。經過兩年這樣補習，我終於在 1915 年秋季考入附近頗為有名的鶴齡英華中學的三年級。當時中學實行的是六年一貫制，所以中學三年級也就是初三年級。

我於 1915 年秋入中學時已十五歲，自己覺得耽誤太久了，年紀太大了；按部就班地再念四年中學才畢業，太晚了。恰好這個中學當時為我們這些「半路出家」的「老」學生開了一個方便之門。鶴齡中學是一個教會辦的學校，每一年級的課程都分為兩部——中文部和外文部，中文部教的是國文、經書、中國史地等等；外文部則包括英文、外國史地、數、理、化、生各科。各班有的上午上中文課，下午上外文課；



少年陳岱孫與母親羅伯瑛

有的上午上外文課，下午上中文課。對每年級的正規生，要求兩部課程都要學習。但中文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可以在入學考試時，申請參加中文特別考試，報名入「專讀班」。申請參加特別考試的學生，除和應考正規學生一樣要參加規定的各門入學考試外，還要參加三場中文考試，寫三篇文章——經義、史論和時事對策。考試及格被錄取後，「專讀生」可以免修各年級的全部中文部課程，專讀外文部課程，這樣就可以大大縮短上學的年限。唯一作難的是，如果這三場中文考試不及格，即使其他規定的各門考試都及格了，考生不但不能錄取為「專讀生」，也不能退一步請求入正規班，我和一些自認為年齡太大的學生一樣，只好「背城借一」硬着頭皮去應這特別考試。幸而被錄取了。在這個中學，我以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最後四年的外文部課程，於1918年年初畢業。年限是縮短了，但這樣連蹦帶跳的學習卻帶來了不小的損失。對其他課程，問題不算太大，但數學卻遭了殃。例如代數和幾何同時念已經夠麻煩的了，上半部代數和下半部代數，上半部幾何和下半部幾何同時念更是搞得糊裡糊塗，雖然不知道當時如何也都混得及格，但基礎打得不扎實，從此對於數學產生了畏怯的心理，也就斷絕了後來曾一度有意學習理工科的道路。

1918年中學畢業後，在家準備了幾個月，夏初到上海應

清華學堂的插班考試，獲取入高等科的三年級。清華當時的學制是八年，分中等、高等兩科，每科四年。高等科的一二年級約等於高中的二三年級，而高等科的三四年級則等於大學的一二年級。

清華在上海的考場設在四川路的青年會附中內。為了便於應考，我住在當時所謂英法租界交界馬路的三洋涇橋段一個小客店內，客店東邊不遠就是黃浦灘，緊張的三四天考試過去後，一天下午我去黃浦灘走走。沿江是一片綠化帶，細草如茵，間以疏落有致的樹木。我正待步入公園時，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塊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華人與狗不許入內」幾個大字，對於這橫逆和凌辱，我當時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因為關於這類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地止步了，瞪着這牌子，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在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過氣來，我不知道。最後，我掉頭走回客店，嗒然若喪，第二天乘船回家。我們民族遭到這樣凌辱創傷，對一個青年來說，是個刺心刻骨的打擊。我們後來經常批判那個年代出現的所謂各種「救國論」，但是只有身歷了這樣心靈上創傷的人才會理解「救國論」，有其產生的背景。

在清華兩年，只是應付功課，但也忙得可以。鶴齡中學畢業和清華高等科三年級相銜接的差距不大，但清華高等科三年級學生，經過了六年來年年的淘汰，和插班生的不斷的

遴選補充，都有一定的水平。由於眼光都看着將來選送出洋學習的機會，學習都十分努力，競爭是劇烈的。

在清華第一學年的結束前，趕上了「五四」運動。當然，遊行、請願、宣傳等活動都參加了，但也只有搖旗吶喊的份兒。我當時總覺得我們似乎有一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想起了古書中所說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積貧積弱顯然是導致橫逆的原因，那麼富強似乎是當務之急，這也許是一種糊塗的「經濟救國論」的意識罷，但當時卻沒有賦以甚麼「論」的外衣。

1920年夏我從清華畢業了，經過甄別，獲得了公費留學美國的機會；秋天，遠渡太平洋到美國中西部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插入三年級；真的以經濟學為專業了。

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平平穩穩地讀了兩年，得了學位，然後，幾乎完全為了慕名而申請入了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哈佛大學——當研究生。在哈佛大學讀了四學年。

哈佛大學四年是我學習最緊張的年頭。美國大學本科的功課一般並不繁重，所以，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時，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便可應付裕如。星期日、假日經常和同學們到附近參觀、旅行，藉悉異國的習俗、風尚。兩年下來，成績雖不算翹楚，但亦不弱於儕輩。因此，對於學習不免產生了掉以輕心的情緒。但到了哈佛研究生院後不及一兩個月，驕矜

之氣被徹底打垮了，從此開始了一段發憤讀書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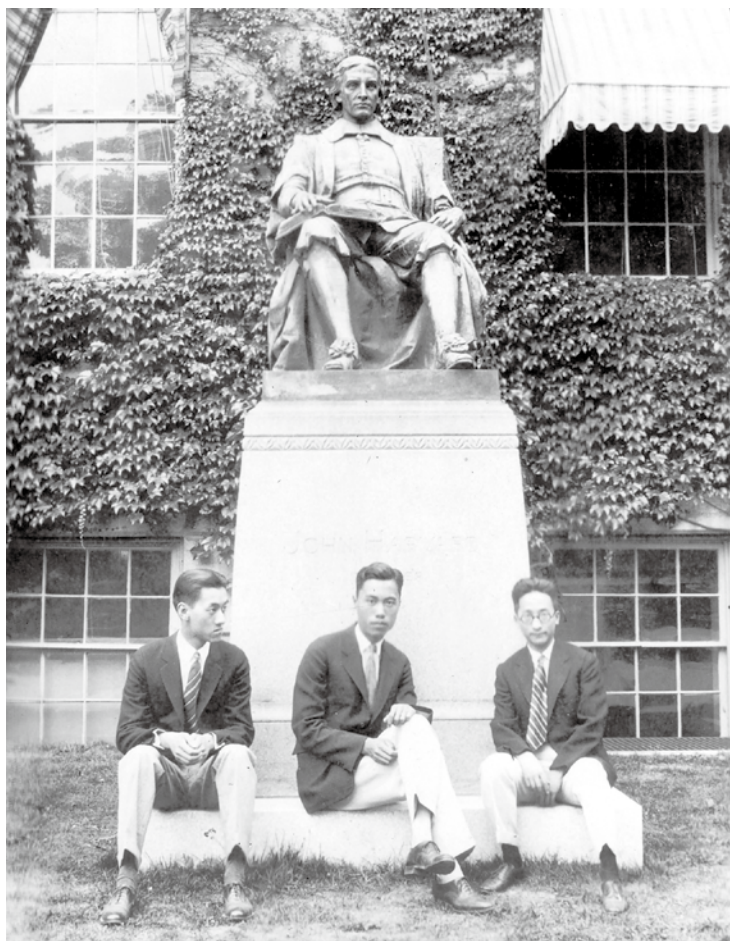
哈佛經濟系這一學年新入學的研究生大約有二十幾人，其中又約有一半是在大學畢業參加一段教書研究工作之後才來再求深造的。他們的底子較厚，思想較成熟，其他從本科畢業直接升學的人也十有八九是各大學畢業班中的尖子。在同班中，不少人後來被證明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例如，後來鼓吹「壟斷競爭」學說、當上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的張伯倫，回到瑞典斯特哥爾摩大學任教、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奧林，在當時都已露了頭角。經濟系研究生有一個自修室，自修室旁邊有一個「西敏納爾」（討論班）小教室。我們這第一年的研究生，除了上課外，大部分人每天都來自修室，經常相互問難。當分歧激化，為了避免干擾別人，執辭不一的人就退入討論班小課室，然後大聲爭辯，這種場合我也有時參加，但不久就有點內怯，感覺到自己的學識大不如人。四年發憤苦讀的生涯就是在這壓力下逼出來的。在這四年中，沒有星期休日；除了有兩個夏天離校參加中國留美學生夏令會的二十天外，寒暑假也基本上取消了。

在研究院兩年後，我獲得了一個更好的讀書條件。由於導師教授的推薦，我被批准在圖書總館書庫裡使用一個擺有一小書桌的研究小隔間的權利。這樣，我不但可隨時憑證入庫，而且可以整天待在裡面讀書，隔間的旁邊就是書庫的一

排一排書架，我再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瀚而自己是如何淺嘗無知。我在哈佛大學最後兩年基本是在這隔間中度過的。書這樣多，方面這樣廣，我又患了貪多務得的毛病。除了經濟學專業書籍外，我還常常瀏覽了一些其他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等名著。有時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實在累了，我就到圖書館另一層的一個特設的文學閱覽室去。那是一個四圍羅列歐美文學名著的開架閱覽室，入室不許帶書包或自己的任何書籍。在寧靜的環境、柔和的燈光下，我藉此消磨了晚飯的兩小時，也就消除了一天的勞累。

這是我平生一次最長期的密集的讀書時間。雖然確也涉獵了不少書籍，但這樣經常是看着一本盯着另一本的讀法，到底有甚麼用處也是可以懷疑的，然而當時是以之為樂趣的。我離開哈佛大學時，別的沒甚留戀，就是為這個密集讀書生涯的結束，有點惘然。

在哈佛大學四年，得了碩士（1924）、博士（1926）學位後，學業結束了。我獲得留學生監督處批准預支餘下的四個月的公費和回國旅費，於1926年4月渡大西洋到了歐洲。1926年，歐洲主要國家如英德等國經濟情況比較穩定，生活費用較高。只有法國適值一個通貨膨脹時期，法郎匯價不斷下跌；對於我這樣懷的是外國貨幣的人來說，生活遠為便宜。所以在歐洲時間，除了在英國和大陸若干國家作短暫的旅行



陳岱孫（左）與同學李韜（中）、曾昭承（右）在哈佛大學校園（1924）

外，我主要定居在法國，在巴黎大學聽課。巴黎大學像一般歐洲大陸許多國家的大學一樣坐落在城區，教室緊靠馬路，沒甚麼門禁。任何人可以不經批准自由進入教室坐下聽講。只要循規蹈矩，絕沒人加以干涉。北京大學在沙灘的當年也有類似的傳統。當時不少有志於學問而無力入學的窮學生是北京大學的「偷聽生」。這個傳統是值得讚賞的。為甚麼要高其門牆拒這些人於千里之外呢？

1926 年底，資斧不繼了。買了一張從馬賽到上海的船票後，便不名一文。借了十英鎊以為火車及沿途之用，才勉強成行。走了三十幾天才到上海，轉回闊別七年的福建老家。

前途如何，有點茫然。學的是經濟，但絕無意於銀行、商業。這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年代。到上海時，北伐軍已佔領了武漢。回到家不久，我忽然收到一位向未謀面的先後期同學從武漢來的電報和信，讓我到武漢去參加工作；說了些革命形勢進展至速，財經人才至缺，學以致用等等的話。心為之動，但七年在外，行裝甫卸，想多盤桓幾時再去。所以，我覆信給那個朋友告以實情，答應於短期休息後，即去武漢聆教。接着北伐軍又打下了上海、南京。但忽然革命形勢大變，寧漢分家，第一次革命失敗了。在武漢那位朋友被迫離開了武漢暫返上海，來了一信略說事變的經過，抱歉地說，前事不能再提了。恰在這時候，我接得清華大學的電報和聘書，讓

我去經濟系任教。我接受了。八月首途，由於京滬火車不通，北上之船沿途耽擱，九月初才到北京。學校已上課兩天。到校報到之翌日就上課堂，從此開始了幾十年的教學生涯。

在清華的頭五年，我整天忙於教學。經濟系四年的專業課不算少，而教師不算多。每個教師每年都得擔任三門課，每星期八至九小時。在哈佛大學時，我的專業方向是財政金融，在清華主講的也有這一門。在教學過程中，我特別感到對於中國有關這些方面的歷史和現況的知識太不夠了。因此在這幾年中，我在這些方面花了不少時間來充實自己，也以之補充教課的內容。

1932年清華大學給我一個休假研究一學年的機會，並提供了旅費和等於一個學生助學金的生活津貼。我又去歐洲住了一年。這次出國目的是為了寫《比較預算制度》一書做準備工作；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國內幾乎完全沒有。在巴黎我住了半年，在倫敦住了四個月。這又是一次甚為密集的讀書階段。但這次讀書範圍明確，只以和專題有關者為限，在巴黎除了週末聽次歌劇或交響樂演奏外，幾乎每天都在法蘭西國家圖書館搜找、抄錄有關的資料。在倫敦，大部分時間也消磨在不列顛博物院裡。成果還不錯，搜集的資料陸續寄回清華以備回國後整理。但一個不期的事件打斷了在倫敦的工作。

三十年代頭幾年，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處於1929年經濟



任教清華時的陳岱孫 (1930 年代初)

危機後的一個長期蕭條階段。1933 年初幾個主要國家發起，於是年夏在倫敦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經濟貨幣會議」，希望在這會上達成某種協定以緩和在國際貿易、匯兌措施上相互卡脖子的局勢。所有國家都被約參加了。中國當然也是被約參加國之一。

當時中國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遠沒有如其他許多國家那樣嚴重。但我們卻為蕭條中出現的一情況所困擾。那就是所謂「白銀問題」——銀價下跌影響及其對外匯率和國際貿易與支出的影響等問題。大蕭條時期南京上海的政治金融利益集團曾因此而惶惶不安。利益集團的代表宋子文曾藉這個國際會議將開之際去美國和美國中西部銀礦主利益集團勾搭，希望能在這會上為白銀利益集團撈點好處。白銀跌價對中國經濟當然不無不利的影響，例如外債負擔的加重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國內生產沒有受到蕭條的更嚴重的打擊，未始不在一定程度上拜銀價下跌之賜。我們所憎惡的匯價高漲也許還是一種「偽裝下的祝福」。這一點卻為國內經濟界和經濟學界所忽視了。

我曾於 1932 年底去日內瓦幾天。當時中國正在國際聯盟控告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和建立偽滿洲國的侵略。南京政府起用了閒置多年的老外交家顏惠慶代表中國來日內瓦和日本周旋。我去日內瓦的目的是為了看看這一鬥爭的現場情況。

在和顏惠慶一次遇見的閒談中，我略述了我個人對於白銀問題的意見。也許是由於這一次的接談，當顏受命去倫敦組織中國參加「國際經濟貨幣會議」的代表團時，他找我以專家的身份參加代表團。我告訴顏我有顧慮，因為宋子文當時正從美國來到英國，傳聞他將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我的觀點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企圖是背道的。顏說，宋只參加開會式，開會之翌日就去歐洲大陸返國，而他自己將是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我於是答應了，在開會期間，我天天參加大大小的會，但中國當時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對於會上利害折衝的問題，毫無置喙的餘地。參加這種會，精神是苦悶的。

會開了一個多月，爭吵得厲害但毫無結果。晴天一個霹靂，新就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沒有打任何招呼，宣佈他的「新政」措施，給會議以致命的打擊。先前想通過會議達成某些國際協議的希望完全破滅了。會議草草宣佈結束，各國代表都鳥獸散；我恰在這事情發生前十幾天得到「太平洋學會」的電報，讓我於八月中去加拿大的邦佛城參加它的雙年會。我並不是「太平洋學會」會員，算是客人罷。倫敦會議的結束解決了這兩個會議時間的可能衝突。我盡幾天之力寫了一個參加倫敦會議的總結報告，交給顏惠慶，隨即搭船去美國轉去邦佛。

「太平洋學會」是一個民間組織。邦佛年會本來會序也側

重於討論從民間的角度如何緩和大蕭條對太平洋地區各國衝擊的問題。羅斯福的新政措施的宣佈，對於邦佛會議也產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主題提不上日程了。會開得很不出色，十天左右匆匆地收了場。會後，我在加拿大洛磯山幾個名勝湖區轉了一轉，借作休息，九月初就搭船返國回到清華重理粉筆生涯。

1933年後，國內情況很不好。外侮日亟，而當道者方致力於內訌，華北時局尤為險惡。1935年，清華決定停止在校內修建一座規模頗大之文、法學院大樓，把這四十萬元的基建款轉投資於長沙嶽麓山，籌建一套新校舍，以作華北戰事爆發的退步。1937年戰事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聯合搬長沙組織臨時大學。地點的選定和已有校舍的經營不無關係。但當臨大在長沙於十月開學時，新校舍尚未竣工，到了將大致可以利用的翌年春，臨大又再搬昆明了。

盧溝橋事變時，我在北京。十來天後，我和幾位校內同人去廬山開會。會上雖然也有慷慨陳詞者，但主要的基調仍是委曲求全，會後下山北上到天津，戰事已起，平津交通斷絕。我困在旅店，直至平津地區全部淪陷，兩地通車才回北京，暫住城內友寓，和校內電話聯繫。校務會議同人（梅貽琦校長尚在南京）因城郊交通沒有保證，不讓我返校，而來城裡和我一起開個會，建議我即日南下商量遷校事宜。當時使我

稍有遲疑的是對分放在校內寓所及圖書館樓下研究室的在歐洲搜集的關於預算問題的資料和這二三年陸續寫的手稿的保存的關懷。但一轉念，打仗總得有損失，凡此一切只可當它已毀於炮火。當即決定不回校寓，翌日即返天津，乘船到青島，轉赴南京。到南京後，知道已決定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又匆忙奔赴長沙。

臨時大學在長沙上了一學期課，上海退卻，南京陷落，武漢告急，臨時大學決定遷昆明。我和臨大南嶽文學院幾位同人結伴由公路經廣西，入越南，由滇越鐵路到昆明。臨時大學改為西南聯合大學。昆明臨時租借的校舍不敷用，聯大的文、法學院暫搬蒙自，上了一學期課又搬回昆明，從此聯大在昆明經歷了八年歲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乍傳，許多人都以為可作立即北返之計，但很快地知道其為不現實。學校當局不久就做出1946年夏秋間復校的決定，由三校各自先行派出先遣人員接管、修葺平津校舍，我被派同土木系王明之教授於11月飛平，組織並主持「清華校舍保管委員會」工作。

保委會工作進行約十個月，工作人員約三十人左右。由於清華校舍為日軍佔用嚴重破壞，保管修葺工作十分緊張。保委會進駐學校時，佔用校舍之日軍傷兵醫院只能讓出貫穿清華園中部小河的南岸的校舍，北岸仍然住滿了待遣返的日

軍傷兵；雙方劃河為界。我們人員白天工作之餘每天晚上還得分班和日軍士兵隔河相望地巡邏各自防區。日傷兵最後一批於翌年 8 月才遣送完畢。但修繕工作不能等待。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劃，1946 年新年就開始招標、備料、包工；一解凍就全面開工；到了 8 月，勉強做到可接待從昆明回來的師生和初步滿足秋季始業的教研工作各方面的要求。

從復校到解放只有短短的兩年。但這兩年卻使人確信國民黨政權已經完全腐化；垮台就在目前。1948 年暑假後，時局有急轉直下之勢。有些人辭職走了。有一天晚上同系的一位教授來找我，說他決定全家去美國，勸我早為之計。我說我理解他要走的心情，但我不走，也不準備後悔這個決定。清華於 1948 年 12 月解放。翌年全國大部分都獲得解放，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宣言，表達了一百多年來備受橫逆凌辱的中華民族的一致宏願。

我還在清華工作到 1952 年。1952 年，北京院系調整，新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學院」。我轉到這個學院。翌年這個學院取消了，我又轉到北京大學，從此一心一意地繼續做教學工作。

回顧一下，應該說我的一生是和書打交道的。而我對於讀書也確乎有興趣。但可惋惜的是在結束了學生生活之後，

讀的書越來越少，還出現了空白時期——八年抗戰，十年浩劫，一下子就去了近二十年。

書總是要讀的。人類的進化賴於知識的積累；而知識則主要藉書而傳遞。「讀書無用論」是一個大騙局；再不能讓人們有日回顧「恨不十年讀書」了。從今以後，在安定的局面下，想讀書的人將能不負於新社會為他們創造的良好的讀書條件和機會。這是值得慶幸的。

1982 年 5 月

（原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一輯，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2 年版）

私塾內外——童年學習生活片斷

到 19 世紀的末年，我國才有新式的學堂；但還不普遍，在這之前，私塾是童、少年就學的唯一場所。從 19 世紀末年到 20 世紀初年，新式的學堂和私塾並存了一段的不短的時間。

有的私塾是由老師自辦的；在自己家裡騰出一間屋，招收了若干童、少年並由他來講授。有的私塾是由一家人家單獨或幾家人家合組聘請一位老師來專門教導他們家裡的子弟們的。一般說來，一個私塾只有一位老師，而可能有七八個、十來個學生。

我的童年時代恰處於這個從私塾到新式學堂的過渡時期。所以我從六歲那一年年初（1906）起到十五歲那一年的夏天（1915），足足上了九年半的私塾。十五歲那一年的夏天，我考取了新式學堂的一中學成為三年級（當年中學實行的是六年一貫制，三年級即現在的初三）插班生。

私塾內學習的當然是中國的古書；主要是經、史，輔以詩、文。我記得我入私塾的第一課就是由老師講授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中的《論語》這一書。（當然



七歲時的陳岱孫

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學過若干的漢字，念過一些幼兒讀物如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等等。）念完四書之後，便開始讀經了。（其實，四書中的《論語》、《孟子》同時也就是兩種經。）七八年中，把所謂十三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中，除了《論語》、《孟子》及《孝經》在開始上學時念過；《爾雅》一書實是古代的字典，沒法可以當書來念，只好取消外，其餘都念了一遍。雖然，老師對文字加以講釋，我和我的同學恐怕沒有一人真知道書的內容，只要能和順口溜一樣從頭念下去，就算不錯。

經之外主要的讀物是史——中國歷代的史。經和史幾乎是同時誦讀的。史可分為通史和斷代史兩種。關於通史，我在這些年裡念過《綱鑑正史約》、《綱鑑易知錄》、《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等書。我應該補充地說，在讀通史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並讀到一本名為《讀史論略》的書。它把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濃縮為薄薄的一本書，一個朝代甚至用幾句話就敘述過去了。它也許可以稱為一本最簡短的中國通史。通史以外，我還讀了幾部斷代史。其中最主要的是《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所謂「四史」，此外加上《戰國策》、《國語》等幾部應該算為斷代史的書。（實際上，《尚

書》、《春秋三傳》都是史書，但俱已列入經的範圍，這裡就不算了。)

詩和文在我讀書的範圍中，只能算為輔科。文，不限於讀某一本如甚麼《古文觀止》等這一類的選集，而是由老師在各種文集中選出文章作為課文。時代的範圍很廣，從秦漢至明清都有被遴選的。選得最多的是唐宋若干大家的文章。當然，入選的文章都是所謂古文，即區別於由所謂四六形式的對偶句子組成的所謂駢體文的散文。但我的一位老師——下面將會提到的石卓齋老師——也曾選了幾篇駢體的範文讓我讀，說這也是古文之一體，不可不知。我對於駢文頗感興趣，覺得它富於文采。古詩也是作為輔課的，但似不受重視；也沒有一定的教本，而是利用幾本當時認為標準的選本，摻雜着選讀。

學習的形式也有其特點。因為，在一個私塾中的十個，八個學生年齡都不同，程度參差不齊，學習的書本或進度也不完全一樣，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得由老師單個地授課。每天早上入了書房，首先是把書送到老師書桌上，然後轉身向外，進行背誦昨天老師所授的某一段的書。背誦下來，就由老師立即講授書中的新段落，講授後下去自學。背不下來，老師有時可為「提辭」；「提辭」還背不下來，則罰去重習，明日再背。如果屢次背不下來，老師就要用竹板子打手心了，

不是所有念的書都要背。「四書」是要背的，詩文是要背的，大部分經是要背的，史是不要背的。

除了讀書外，私塾第二大項教學工作就是作文章。我大約是九歲左右，也就是說入了私塾三年之後，才開始作文章的。先寫一些如日記、遊記一類的寫景和敘述性的文章，然後才進而寫較為抽象的帶有思辨性的文章。記得當時學寫的文章有三個類型。第一，是「義」。「義」是從經典著作——一般是《四書》——中摘取一句作為題目，要求作者用聖人講這句話的命意作一篇文章。老師教導我們寫一篇「義」所要牢牢掌握的是「代聖立言」這一標準，《四書》這一書，實際上，是以孔子孟子為主的孔門語錄，所以差不多所有可能的題目都是語錄。要求的是作者盡力體會、闡述聖人這條語錄的本意，絕不許有自己的、有悖於聖人立言本意的所謂一切「放言可喜之論」。第二類型是「論」。「論」的題目大多數來自歷史——對於歷史某一事件的評論。第三類型是「策」。「策」是「時事對策」，即對當前國內外時事的意見和建議。對策一辭我國古代已有之。當年皇帝有時接見民間推薦的「賢士」，垂詢他們對於國家政事的意見時。這些「賢士」們的答案發言就是所謂「對策」。不過在本世紀初葉，它卻一變為科場考試的一種文體，二變為私塾習作的文體了。對於這幾種習作文體的熟悉，對我卻有一作用。在我十五歲那一年的夏天投考

中學，為了趕以二年半時間念完四年的中學課程而申請入學後免修中文專習英語各課程時，學校讓我參加一個特別的中文熟練程度的三場考試，要求寫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就是一篇經義，一篇史論，一篇時事對策。私塾的訓練到此派上了用途，考試順利地通過了。此後，「義」、「論」、「策」這三種習作文體都被拋在腦後了。只是在史無前例的「文革」十年動亂中，看到了、聽到了一些對於「經典著作」中某些詞句及幾種「語錄」的所謂「活學活用」的文章和報告，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自顧年齡老大，赧於再為「馮婦」了。

在九年半的私塾生涯中，我受教於三位老師。第一位是啟蒙老師姓陳，我受教於他約三年。第二位是上面已經提過的石卓齋老師，我受教於他約四年。第三位老師也姓陳，我受教於他二年半。三位老師都沒有所謂「功名」，就是說，他們都是科舉場中的失敗者，連起碼的秀才都沒考上，但是在科舉時代有多少人懷才不遇，只可歸咎於命運了。石老師對我教誨影響較深。他是一位有才學的老師。他經史極熟，喜歡吟詩填詞。上面所講三種文體的習作，是他手把手教我的。在他覺得我寫的文章已有一點進步後，他開始教我寫詩填詞。可惜大半年之後，他辭館走了。我沒再繼續學寫詩詞了。石老師對學生很嚴格，不但在學業方面，而且在品德方面。我們本地有一習慣，端午節，老師要送學生一把扇子——學

生當然也送老師以節敬。有一年端午節，他送我一把團扇，上面畫着棵松樹，樹上一隻仙鶴。在扇面上他題了為我寫的一首詩：

本是龍門詡李膺，虬枝得所氣休矜。

人間飲啄原前定，不露聰明即壽徵。

大概當時我在塾中，年紀是較小中的一個，自以為出身於所謂「書香門第」，書還念得不錯，就不時器小易盈地，冒出一些驕矜之氣。石老師及時給我一個訓誡。我感謝我的老師。這首詩我一直記着，不敢忘。

我們私塾的學習的壓力，不算太重，塾中所讀的書，有的我還是有興趣的，但大部分是乏味的。所以我不十分滿足於私塾內的學習。在私塾生涯中的後來幾年，我發現我家有一個裝滿書籍的藏書閣樓。從此，我童年學習除了私塾之內，還有一個私塾之外的部分。我在應付「正經書」學習要求之餘，鑽進這個閣樓，選擇一些似乎可以看懂的書，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地一本本地胡亂看下去。幾年下來，看的書還是不少的；大致有幾類：一類是傳奇性的歷史或歷史性的傳記；一類是詩詞、戲曲，此外還兼帶幾種子書，如《道德經》、《南華經》等。這些書，實際上，對私塾內的學習，是一種補充，

因為它恰恰是「正經書」枯索乏味的對立物。第三類是小說。從中國古典小說到當時西洋小說的譯本，我總看了不下一百多種。這當然幾乎是都屬於趣味性的，雖然其中不少是所謂中外名著。然而它們也讓我多了解一些社會的情況，開闊一些知識面。我覺得應該把這私塾外的胡亂看書，看作我童年學習生涯的一部分，因為它不但佔用了不少我的學習時間，儘管這時間是擠出來的；它確是構成我一生知識結構的一部分。

我十五歲那年夏考入中學後，私塾內外的學習生涯全部結束了。私塾內那些「正經書」當然不念了；也再沒有時間躲在閣樓裡貪婪地偷看那一類的所謂雜書了。必須說，雖然對於學校中的所謂「新學」的學習，我是「半途出家」的學生，然而「半途出家」前九年半的私塾內外的學習並不妨礙我對於後此「新學」的進修。

1986 年 11 月

（本文係作者應北京大學東語系編輯的
《東方世界》之約，於 1986 年 11 月底撰寫）